

故宫学的学科体系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the "Gugong Studies"

郑欣淼

Zheng Xinmiao

故宫博物院
The Palace Museum
Journal of Gugong Studies 2017 Vol.18
故宫学刊
二〇一七年 总第十八辑
故宫出版社 | The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故宫学的学科体系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of the “Gugong Studies”

郑欣淼

Zheng Xinmiao

内容提要:

故宫学是以故宫及其历史文化内涵为研究对象，集整理、研究、保护与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学问和学科，研究对象包括故宫（紫禁城）、故宫文物和故宫博物院，三者相互依存，构成一个文化整体。故宫学自成一套知识体系，可细分为古遗址、古建筑、古器物、文献档案与图书典籍等方面，又涉及宗教学、民族学、文学、艺术学、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学、管理学、图书馆学、档案学、博物馆学等领域。故宫学强调多重论据法，要求综合运用古建筑、文物藏品、图书典籍和档案文献等资料，实现以物证史、以物论史、以物鉴物、以史论物的研究目标。故宫学提倡跨学科研究，要求从对单体文物研究的思路进入哲学化的思维方式即强调联系与发展，进入美学化的思维方式即导向审美与评赏，进入历史化的思维方式即注重社会与背景，并且扩展到对其他学科的认识，防止孤立地看待文物，防止“碎片化”。

关键词:

故宫学 紫禁城 故宫文物 故宫博物院 知识体系
学科特点 方法论

ABSTRACT:

The “Gugong Studies” (*Gugong xue*)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cultural patrimony of the former imperial palace of the Ming and the Qing dynasties (known as “Gugong” in Chinese). It is a comprehensive academic discipline of collating, studying, preserving, and displaying the resource materials of the architectural complex (the Forbidden City), the collections of the Palace Museum, and the Museum entity itself. They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constitute a culture unity. The “Gugong Studies” is a self-contained knowledge system, which is made up of the study of heritage site, heritage architecture, extant artifacts, historical archive, and old books. This specific branch of knowledge also associate with such fields of study as religion, ethnology, literature, art, archaeology, history, architecture, management science, library science, archives, and museology. The “Gugong Studies” emphasizes on multiple grounds of argument. It calls for a collective utilization of source materials of heritage architecture, artefacts of historical value, old books and archive, to represent history and review history with concrete evidence, as well as to appraise extant objects by comparison, and to examine an object with the knowledge of history. The “Gugong Studies” is also open to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ologies – when it comes to the study of an individual object or subject matter, it involves the adoptions of a philosophical mindset that emphasizes on connection and involvement, of an aesthetic mindset that features the appreciation of art, and of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at highlights social background, so as to relate to knowledge of other academic disciplines to avoid isolated viewpoints or fragmented information of the research subjects.

KEYWORDS:

Gugong Studies, Forbidden City, cultural relic of the Imperial Palace, The Palace Museum, knowledge system, 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 methodology

故宫学是以故宫及其历史文化内涵为研究对象,集整理、研究、保护与展示为一体的综合性学问和学科。换言之,故宫学既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独立学科,也是一门知识或学问的集合。

学科体系的构建是故宫学理论建设的一个重点。故宫学从2003年提出的10多年来,在学者专家的共同探索下,其知识体系、学科特点、研究方法及其学术意义、实践价值等基本理论问题及其关系逐步厘清,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201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将“故宫史与故宫学研究”列入研究方向,标志着故宫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已进入新阶段。本文拟对故宫学的学科体系做一初步探讨。

一 故宫学的知识体系

(一) 故宫学是一种知识体系

故宫学作为一门学科,有着独立的、明确的研究对象。在故宫学的概念中,故宫被视为宫殿、文物藏品、宫廷历史文化相互融合的文化群系。从根本上说,故宫学是一种知识体系。

故宫学之所以可以自成一套知识体系,是由故宫学研究对象之间所具备的内在逻辑统一性所决定的。故宫学以故宫古建筑、故宫文物以及故宫博物院为主要研究对象,可细分为古遗址、古建筑、古器物、文献档案与图书典籍等方面,又涉及宗教学、民族学、文学、艺术学、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学、管理学、图书馆学、档案学、博物馆学等学科领域。

在故宫学框架体系内,围绕着故宫(紫禁城)、故宫文物及故宫博物院研究因新的视角、途径、方法而构成新的研究课题,获得新的研究结论和成果,也形成了新的知识体系和学科架构。例如,作为故宫学的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代书画研究将侧重于明清宫廷书画的搜集、鉴赏、著录及流传等,而并不涵盖艺术学学科的全部研究。换言之,故宫学知识体系的建构是围绕着研究对象而展开的。

(二) 故宫学知识体系的构成

故宫学是一个学科的总称,在这一总称或母学科之下,还包含了学术体系的各个分支或子学科,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就是母学科研究对象的一个方面或者一个层次。从故宫学的研究对象出发,故宫学的分支学科至少有以下22个:

1. 故宫建筑学
2. 故宫古器物学
3. 故宫古书画
4. 故宫青铜器
5. 故宫古陶瓷
6. 故宫考古学
7. 故宫历史学
8. 故宫文化遗产学

9. 故宫文物学
10. 故宫音乐学
11. 故宫文学
12. 故宫戏曲学
13. 故宫宗教学
14. 故宫民族学
15. 故宫语言文字学
16. 故宫辞书学
17. 故宫科学技术
18. 故宫图书馆学
19. 故宫出版学
20. 故宫明清档案学
21. 故宫文物保护学
22. 故宫博物馆学

这 22 个分支共同构建了故宫学的学科大厦，也共同构成了故宫学的知识体系。

在故宫学每个分支学科之内，又有若干个系列，每个系列一般都有若干项目。限于篇幅，本文在分支学科下仅分列若干系列或重点项目，不再另列支项目。关于故宫学分支学科亦即知识体系的构成，有五点需要说明：

一是所有分支学科以及分支学科下的系列与项目，都是依据现存的故宫古建筑与故宫文物藏品而提出的，而且在同类藏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或有特殊的意义。

二是在按照现代学科概念分类时，还注意吸取中国有关的传统学问。中国历史上在建筑、文物研究等方面，积累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与成果，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有些至今仍然有着相当的价值，有的已赋予了新的内涵，例如古器物学，还有新形成的文物学、文化遗产学等，也作为故宫学学科体系的组成部分，或与现代学科结合起来。

三是对一些文物研究的学科分类来说，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故宫文物的分类，或是按材质，或是按用途，或者是根据贮放地而分；但文物的价值却并非如此简单。例如佛造像，从使用上是宗教文物，但本身又是艺术品。因此，文物的分类一般是相对的。佛造像既可从宗教学研究，也可从艺术学研究，还可从古器物学的角度研究；或者说，故宫文物只有从多个学科、多个角度、多个方面研究，也才能比较全面深刻地认识它的价值与作用。

四是本知识体系只是大致反映了故宫学的对象和内容，还有一些代表故宫特色的文物应该单列为分支学科而没有单列。例如故宫藏品中的古书画、古陶瓷、青铜器，因影响巨大而列为分支学科。但限于篇幅，藏品丰富且为世所瞩目的玉器、珐琅器、钟表等仅列为古器物学下的重点研究项目。

五是在简述故宫学各个分支学科时，除了对传统学科及新兴学科略作介绍外，其他不再作学科释义。各

学科都有丰富的内容，如书画、陶瓷、青铜器、图书、出版、档案、博物院等，介绍文章很多，人们一般都有所了解，不再赘述。有些学科内容，虽然人们多有了解，但仍有值得重视之处，故特别提出，例如故宫宗教学，其藏传佛教、道教、萨满教等已为人所知，“民俗宗教”则注意不够，但其在宫廷社会生活中有相当的影响，遂对此内容作专门介绍。同样地，清宫演戏人所熟知，明宫演戏则鲜有了解，故在故宫戏曲学中专门介绍明宫戏曲状况。有些学科内容，着重对某件或某些文物予以详细介绍，是基于文物本身的独特性和重要性，例如故宫民族学、故宫语言文字学等。还有一些学科内容，在故宫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并有许多珍贵文物存世，人们却了解较少，特作一些介绍，例如故宫音乐学、故宫自然科学技术、故宫文学等。如此一来，有的学科介绍未着一字，有的则长达数千言，体例上略显参差。

1. 故宫建筑学

建筑学是故宫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早从商代开始，重大的建筑活动就是由官方进行管理的，形成了官式建筑与地方和民间建筑并行发展的格局。北宋官修《营造法式》和清代雍正时期颁发的《清工部工程做法》分别代表了宋代和清代官式建筑的规则。中国古代官式建筑是由官式建筑技艺建造、保存和延续的。20世纪30年代，以中国营造学社为代表的一批学术带头人开始了解读中国古代建筑天书的伟大学术实践。他们采访古建筑从业的著名匠师，“沟通儒匠”，对照故宫和北平的其他重要皇家建筑、匠师语言和宋、清这两部专书，读懂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结构法则和技术做法。中国营造学社所开创的古建筑法式和文献研究、古建筑实地调查测绘和古建筑修缮保护的方法和原则，对今天故宫的保护修缮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故宫与中国历代宫城与宫殿研究

故宫与历代宫廷建筑研究

故宫营造史

故宫营造文献学

故宫建筑技术研究

故宫建筑艺术研究

故宫建筑工程研究

故宫园林研究

故宫建筑文化研究（古代建筑制度、规划思想、风水学说等）

清代“样式雷”图档及烫样研究

故宫古建筑文物研究

中国营造学社的故宫研究

故宫建筑实测与研究

故宫官式古建营造技艺传承研究

单士元与故宫保护研究

2. 故宫古器物学

中国古代器物学从北宋中期计算，已有将近千年的历史。但是古器物学虽有其学却无其名，长期依附于金石学，因而二者在概念、分类方面总是纠缠不清。1918年罗振玉在《古器物学研究议》¹中，指出对于古器物的研究应成体系，并作为专门的学问，提出古器物学应分为15类目：礼器、乐器、车器马饰、古兵、度量衡诸器、泉币、符契鈔印、服御诸器、明器、古玉、古陶、瓦当砖甃、古器榘范、图画刻石及梵像。张舜徽随后又增加了“甲骨、碑刻、竹木石简、帛书帛画、历代书画、雕刻、刺绣、瓷器、料器、文具之类”²。中国传统的金石学、古代器物学有其优良的传统，例如讲究器物称名，记录器物信息，比照历史文献，以物证史，以史明物，自成体系，富有民族文化特色。当然，古代器物学发展到今天，其内容和方法已得到很大拓展和丰富，是一门新兴的学科³。

故宫礼用器具与祭器研究

故宫玺印研究

故宫卤簿仪仗研究

故宫服饰织绣品研究

故宫武备兵器研究

故宫玉器研究

故宫珉琅器研究

故宫雕塑研究

故宫金银器研究

故宫漆器研究

故宫玻璃器研究

故宫钟表科技仪器研究

故宫文房用具研究

故宫竹木牙角匏器研究

故宫明清家具研究

故宫鼻烟壶研究

故宫盆景研究

故宫成扇研究

故宫如意研究

故宫药材、药具研究

故宫地毯研究

1 《北京大学日刊》第215号，1918年9月28日；后收入《永丰乡人稿》甲编《云窗漫稿》，改题为《与友人论古器物学书》。

2 张舜徽：《爰晚庐随笔》，第327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3 陆锡兴：《从金石学、考古学到古代器物学——代〈南方文物〉“名物新证”专栏主持辞》，《南方文物》2007年第1期。

故宫其他器物研究

3. 故宫古书画

中国历代宫廷书画收藏研究

中国古代书画的宫廷收藏与私家收藏及其聚散流转关系研究

中国历代宫廷绘画机构研究

宋代宫廷书画鉴藏与著述研究

明清皇室的书画活动

故宫藏明清帝后书画研究

乾隆皇帝书画鉴评研究

清宫外国画家与西洋画风研究

《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编纂研究

清代帝王行乐图、南巡图及战图研究

清宫缂丝书画研究

清宫铜版画、木版画研究

《快雪时晴帖》《平复帖》《中秋帖》等法书名迹研究

《韩熙载夜宴图》《清明上河图》《富春山居图》等绘画巨品研究

清宫碑帖研究

《三希堂法帖》《敬胜斋法帖》《钦定重刻淳化阁帖》《兰亭八柱帖》等法帖刻石研究

清宫书画佚散研究

清宫书画国内外存藏状况研究

故宫书画整理鉴定研究

徐邦达与中国古代书画研究

4. 故宫青铜器

中国历代王室青铜器收藏研究

宋代宫廷青铜器收藏与《宣和博古图》编纂研究

清宫青铜器收藏与“西清四鉴”（《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乙编））编纂研究

“西清四鉴”的佚散与存藏研究

清内府原存从康熙至光绪各朝未曾流通钱币研究

故宫藏历代铜镜及清内府造铜镜研究

故宫藏秦汉青铜器研究

故宫藏唐宋以来仿先秦青铜礼器研究

古物陈列所收藏的沈阳故宫与承德避暑山庄青铜器研究

故宫博物院青铜器陈列展览与整理研究

两岸故宫博物院所藏青铜器的渊源与联系

两岸故宫博物院藏青铜器的比较研究

故宫藏有铭青铜器研究

容庚与故宫青铜器研究

5. 故宫古陶瓷

中国历代皇室收藏瓷器研究

宋代官窑与官窑制度研究

元代枢府瓷与官窑制度研究

明代御窑瓷器与御窑制度研究

清代御窑瓷器与御窑制度研究

明清宫廷与景德镇御窑厂研究

康雍乾三帝与珐琅彩瓷器研究

乾隆皇帝与十八世纪的瓷器鉴赏研究

明清宫廷陶瓷史

明清民窑生产与民窑瓷器及其与宫廷的关系研究

五大名窑（汝、官、哥、定、钧）瓷器研究

清宫瓷质礼祭器、供器和宗教造像以及仿古瓷研究

清代瓷器生产的图像学资料和瓷器实物研究

瓷器与明清宫廷文化研究

宫廷紫砂研究

故宫藏外国瓷器研究

清宫瓷器散佚研究

故宫藏明清传世官民窑瓷片与古代窑址资料研究

故宫藏瓷的整理、编目与研究

陈万里与古代窑址调查研究

英国大维德爵士与中国瓷器收藏研究

6. 故宫考古学

配合紫禁城内有关施工建设对古建遗址的考古发掘

明清宫廷建筑考古

中国历代都城、宫殿、园囿、陵墓遗址及官式寺、观遗址考古

古代皇家作坊遗址考古

故宫藏青铜器、玉石器的考古学研究

古陶瓷窑址考古

故宫藏佛教文物与石窟寺调查与考古

故宫藏藏传佛教文物与汉藏文化交流的文物调查、田野考察、考古发掘

7. 故宫历史学

故宫与历代宫廷史

明清宫廷政治史

明清宫廷典制史

明清宫廷生活史

明清宫廷艺术史

明清宫廷其他专门史

明清宫廷人物研究

故宫与明清中外文化交流史

故宫与清代外国使团研究

故宫与明清藩属国研究

中外宫廷史对比研究

8. 故宫文化遗产学

文化遗产学是随着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持续升温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热潮而产生的一门学问，也是正在创建着的新兴学科，主要研究文化遗产的基本概念和总体构成、综合价值，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原则、机制、方式等。文化遗产学具有理论与应用实践并重的特色，研究既涉及观念层面，也具有明确实践性的内涵。故宫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最有代表性的载体之一，是世界文化遗产。从文化遗产学的视野研究故宫的价值与保护，对于开阔视野，提高保护的科学性，无疑是很有意义的。

故宫遗产在中华文明史中的价值与地位研究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研究

故宫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研究

故宫与“大故宫”研究

故宫 90 年修缮保护史

故宫百年大修与遗产保护理论研究

故宫保护修缮项目的个案报告、研究与经验总结

故宫保护法规的制定与实施研究

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与故宫保护研究

故宫保护与北京城市建设发展研究

9. 故宫文物学

“文物”一词在我国源远流长，把物质文化遗产称为文物，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文物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是文明古国，文物丰富多彩。自古以来中国就十分重视对文物的研究。从这个意义

上说, 文物学在中国是一门古老的学科。然而, 现在所说的文物学, 又赋予了新的内涵, 进行了科学的梳理和概括, 因此又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文物学研究文物的基本要素以及文物的分类、鉴定、文物的价值与作用、文物的保护管理, 并且研究具体的遗物与遗迹等¹。文物学有助于对清宫文物的全面研究与认识。

中国历代皇室文物收藏研究

清宫文物收藏史

清宫文物分类、整理与编目研究

清宫文物藏品意义研究

英法联军对圆明园劫掠和焚毁研究

八国联军对皇室财宝抢劫与破坏研究

逊帝溥仪暂居宫禁时清宫文物损毁、流失研究

清宫文物国内外散佚研究

清宫散佚文物征集、追索研究

清宫文物存藏与管理研究

10. 故宫音乐学

宫廷礼乐文化是中国古代宫廷生活、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宫廷音乐始于西周制礼作乐, 此后各代相承不替。我国帝制时代的“正史”, 皆有《律历志》《乐志》等名目不一的宴乐典志, 《清史稿》也有专门的《乐志》²。宫廷音乐就使用性质而言, 分为雅、燕二乐。雅乐, 泛指宫廷祭祀和朝会活动中的礼仪音乐; 燕乐, 也称“宴乐”“讌乐”, 后世兼表各种宴饮、游乐音乐。

明代迁都北京后的宫廷音乐, 皆沿袭洪武旧制, 历朝虽略有增删, 终无较大改动。明代宫廷音乐, 从性质划分, 有雅乐、军乐、俗乐三类; 从功能划分, 有祭祀用乐、朝会用乐、宴享用乐等数种。其中祭祀、朝会用雅乐, 卤簿用军乐, 宴享则雅俗并用。明代宫廷音乐所用箫、笛、笙、箏、头管、琵琶、箜篌、方响等当时所谓的细乐, 亦称俗乐, 曾受到了元代宫廷音乐的影响。经查考, 明宫各种宴乐中, 标有曲牌名的(不含重出)不少于70余首, 其中至少有30余首是元代散曲和杂剧中的曲牌, 有些还是元曲沿用唐宋时期的词牌。明代宗室中, 通晓音律、戏曲的人很多。出身于明宗室的朱载堉(郑恭王厚烷之子), 是我国古代非常有名的声学家、乐律学家、音乐家。在其多达百万字的著述中, 尤以《乐律全书》最为著名, 其主要价值即在于十二平均律理论的首创。明宁献王朱权善古琴, 编有古琴曲集《神奇密谱》《北曲谱》和《太和正音谱》等。《太和正音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北杂剧曲谱(清代《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以此基础扩编而成), 其制作的飞瀑连珠琴, 是历史上有所记载的旷世宝琴, 被誉为“明代第一琴”。

清代宫廷用乐制度, 开始大都沿用明制, 只改撰乐章, 更定了乐章名称。康熙五十二年, 康熙帝经多年研习乐律, 诏修乐律丛书《律吕正义》5卷, 分上、下、续三编。上编“正律审音”, 论述历代有关十二律损益相生之说, 总以复古为归宿; 下编“和声定乐”, 论述乐器的制造理论, 并附有图解; 续编“均协度曲”,

1 参阅李晓东:《文物学》, 学苑出版社, 2005年。

2 参阅陈万鼎:《〈清史稿·乐志〉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0年。

讲述耶稣会士葡萄牙人徐日升和意大利人德格里把五线谱和音阶唱名传入中国，并证以经史所载律吕宫调诸法；各编之中，均考记古今之异同。此书制定了清宫律吕制度，并据以改造乐器，对清宫音乐作了一次大的整顿。乾隆朝敕编《律吕正义后编》120卷，以补前书之不足。主要记载清代初年的宫廷典制音乐。分祭祀乐、朝会乐、宴飨乐、导迎乐、行幸乐及乐器考、乐制考、乐章考、度量衡考、乐问等10类。书中记载了大量的清代宫廷中的乐谱、舞谱和乐器图，包括丹陛大乐、清乐、饶歌大乐、蒙古族的笛吹乐、番部合奏诸乐之乐谱及回部、瓦尔喀部和朝鲜族诸族之乐器，均为珍贵的史料。这是历史上唯一一部载有乐谱的宫廷音乐书籍，由此我们可以大体了解到宫廷音乐的面貌。也使我们得知宫廷音乐与民间音乐是有联系的，一种是把民间音乐收入宫廷，同时也可能有宫廷音乐传入民间。如宫廷音乐中的《导迎乐》和寺庙中、京剧中的《朝天子》以及宫中曲牌《银钮丝》与民间音乐《探亲家》就同出一辙。宫中曲牌的《海青》竟在承德寺庙音乐中出现。这是以往所不了解的¹。有关资料还记载了西洋音乐传入康熙、乾隆时宫廷的状况²。

北京故宫珍藏的清乾隆六十一年（嘉庆元年）内府泥金精写本《笛吹番部合奏乐章满洲蒙古汉文合谱》共辑蒙、藏少数民族音乐词章和廓尔喀（今尼泊尔）、缅甸、安南（今越南）等国乐章百余首，是一部清代宫廷宴乐专著³。此外，北京故宫珍藏的《塞宴四事图》描绘了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开筵设宴时蒙古族音乐“什榜”的演奏情况，真实记录了蒙古族音乐在清宫的使用情况⁴。清乾隆年间，和硕庄亲王允禄奉敕编纂《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征调乐工周祥钰、邹金生、徐兴华、王文禄、徐应龙等人主管，并调集大量通晓宫谱的民间艺人参加。全书82卷，上溯唐宋，下迄明清，收录南北曲牌2094个，加上各种变体曲2372个，共有4466曲。这些曲牌内容包括唐宋词、大曲、南戏、杂剧、金元诸宫调、元明散曲、明清传奇、宫廷宴乐及不同格律的韵文乐谱等。北京故宫珍藏有该曲谱的清乾隆十一年殿刊朱墨套印本。

北京故宫收藏大量清宫乐器，例如铜镀金编钟，就是清代宫廷最重要的乐器。铜质镀金，整套十二圆以应十二律。整套钟以钟体大小顺序排列：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钟体阳面镌乾隆皇帝御制铭，记载了钟铸造缘由，并阐发了统治者对儒家礼乐治国的理解。背铸钟名，周围均布乳钉36个。十二圆钟各有钟架，非常壮观。皆涂金，上左右雕刻龙首，脊树金鸾，鸾与龙首均衔五彩流苏。中悬钟，左右两虞插入五彩伏狮。十二圆钟用时不同时摆放，仅设当月之律钟，如十一月设黄钟，十二月设大吕，正月设太簇，以此类推。朝会之时列于太和殿檐下东侧，位居编钟之东。

中国历代宫廷音乐史

朱载堉《乐律全书》研究

故宫藏唐宋名琴研究

《律吕正义》与康熙皇帝的音乐研究

《律吕正义后编》与乾隆皇帝整理宫廷音乐的研究

1 万依、王树卿、刘璐：《清代宫廷史》，第316～32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万依主编《故宫志》第503～505页，北京出版社，2005年。

2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第624～627、629～6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3 齐秀梅、杨玉良等：《清宫藏书》，第278～280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4 袁荃猷：《一幅难得的清代蒙古族作乐图》，《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

故宫藏乐器与乾隆时期的乐器制造研究

清圜丘大祀音乐与舞蹈研究

清宫乐队组织与乐器研究

《笛吹番部合奏乐章满洲蒙古汉文合谱》研究

乾隆朝《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研究

清代藩属地区所献乐器、乐舞研究

故宫藏满族特色乐器研究

康熙、乾隆时期西洋音乐在宫廷流传研究

故宫藏铜镀金铎钟研究

11. 故宫文学

宫廷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一种重要类型，作者主要是帝王本人及其御用文人和一些朝廷大臣，其活动场所是帝王的宫廷。帝王的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对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的历史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汉代以后，帝王好文，几成风气。汉武帝有《秋风辞》千古流传，并且促进了汉代辞赋的发展。三国曹氏父子更是杰出的代表。朱元璋有《明太祖文集》，今人纂《全明诗》，收太祖诗211首。北京故宫藏有明内府精写本《大明太宗御制集》残存2卷，为永乐皇帝御制集的第三、四两卷¹。明宣宗朱瞻基不仅擅绘画、书法、弹琴，且诗文亦很有名。明代宗室的诗文创作成就非常突出，据清代陈田《明诗纪事》统计，明代宗室传世诗文集共86人、102种，其中秦简王朱诚泳诗名最盛。

降至清代，拥有深厚文化功底的帝王更是多有文集传世。顺治帝诗作不多，未编御集。康熙存有《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176卷，囊括了诏谕、奏书、表、辨、序、古今体诗等多种文体，其中古今体诗1135首，词12首，赋18篇。雍正有《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30卷，其中文集20卷、185篇，诗集10卷、540余首。乾隆有《御制乐善堂全集定本》及《御制诗》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余集，现存诗歌总数为43630首。乾隆又有《御制文》初集二集三集余集，共著文1041篇，有论、说、序、记、跋、杂著、表、颂、赞、箴、铭、赋等10多个门类。北京故宫还藏有《乾隆御稿》约45000页，为乾隆帝从康熙六十一年至嘉庆三年长达76年间诗文创作的手稿（大部分为诗稿，小部分是文稿）与词臣的清抄稿。嘉庆帝有《味余书屋全集》《御制诗》初集二集三集及《嗣统述圣诗》《全史诗》，诗作共11760余首。道光帝有《养正书屋诗文全集》《御制诗》初集余集及《巡幸盛京诗》。咸丰、同治、光绪皆有诗作流传²。清代极端重视文治，统治者非常关注文风建设，常通过帝王训饬与御选总集的方式来引导文坛创作方向。康熙御选古文总集《古文渊鉴》，亲自选录始自《左传》、终于南宋谢枋得《交信录》的各种文章1386篇，康熙御批1391节，并命徐乾学等人编注。康雍乾诸帝又通过各种文艺政策、文学活动以及与文人的交往来左右文人心态，影响当时文坛的走向³。清代宗室贵族的诗歌创作也相当有成就。康熙年间玛尔浑辑《宸襟集》、文昭辑《宸萼集》，是两种专收清朝宗室作家作品

1 齐秀梅、杨玉良等：《清宫藏书》，第243～244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2 参阅徐世昌著、傅卜棠编校：《晚晴移诗话》卷一至卷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故宫珍本丛刊》（故宫博物院编，海南出版社，2000年）也收入了咸丰、同治、光绪三位帝王的诗文集：《清文宗御制诗文集》《清穆宗御制诗文集》《清德宗御制诗文集》。

3 黄建军：《康熙帝与清初文坛》，中华书局，2011年。

的诗歌总集,但两书都久已失传。嘉庆初年有《钦定熙朝雅颂集》,是山东巡抚铁保编定的一部旗人诗歌总集,全书共138卷,作者600余人。此书当年曾由著名学者纪昀、朱珪、彭元瑞等参加校阅,嘉庆皇帝亲自作序、赐名,刊刻之后颁赐群臣。从中可见清朝宗室诗风之盛。

清代宫廷文学活动最有影响力的形式是君臣联欢的宴饮赋诗。康熙年间,宫中的宴饮活动就很多,这样的活动大多包含着君臣诗歌唱和的风雅内容,乾隆时期,这种宴饮赋诗活动更加频繁。著名的重华宫新正联句活动,持续时间长达半个世纪以上,参与联句的人数后来确定为18人,取“十八学士登瀛洲”之意。而康、乾两朝宫中的三次千叟宴,又是古往今来规模最大的宫廷文学活动。第一次千叟宴于康熙六十一年在乾清宫举行,参加者1000余人,年龄皆在60岁以上,故名千叟宴。康熙帝席上赋七律一首,诸大臣和者13人,其他千余人各赋七绝一首,后编成《御制千叟宴诗》4卷,共1030首。这些作品的基本内容和风格,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称:“化国之日舒以长,盛世之音安以乐,具见于斯。”乾隆五十年,千叟宴在乾清宫再次举行,参加人数超过了3000人。乾隆帝席上御制七律一首,大臣酬和者23人。乾隆帝又与群臣赋柏梁体联句诗一百韵,其他与宴者皆自由赋诗一首或数首。后编成《钦定千叟宴诗》36卷,共3429首。第三次千叟宴在嘉庆元年,坐上宴席与列名邀赏者总计8000人以上。太上皇乾隆帝依康熙帝当年的千叟宴诗原韵赋诗,新登基的嘉庆帝率诸大臣恭和,与宴者也各有诗。这次未汇编成册,否则其部头当远在前两部《千叟宴诗》之上¹。

中国历代宫廷文学史

中国历代帝王诗文研究

明代“台阁体”诗研究

明代朱氏皇族诗文创制研究

明代宦官与宫廷文学研究²

康雍乾时期的文化政策与文学发展研究

康熙帝《御选古文渊鉴》与清代文坛发展研究

康熙帝与王士禛的诗文交往及对文坛影响的研究

雍正帝与张廷玉的文笔交往及对文坛影响的研究

乾隆帝与沈德潜等文人学士的交往研究

《御选唐宋文醇序》《御选唐宋诗醇序》等与乾隆文学思想研究

乾隆帝诗歌的艺术学、历史学、文化学研究

乾隆帝唱和、联句活动研究

清代词臣恭和、应制类诗歌研究

《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御定历代赋汇》《御制历代诗余》《御定全唐诗》《钦定全唐文》等清代钦定选本研究

1 张明非主编:《帝王文化与中国文学》,第284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2 参阅高忠志:《明代宦官文学与宫廷文艺》,商务印书馆,2012年。

《佩文韵府》《康熙词谱》《康熙曲谱》研究

《熙朝雅颂集》与清代爱新觉罗皇族宗室诗人群研究

故宫藏《乾隆御稿》研究

故宫楹联匾额研究

12. 故宫戏曲学

人们熟知清宫演戏，其实明宫演戏也十分频繁。宫廷戏剧为明宫礼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明代宫廷里的钟鼓司设有戏班子，为帝后御前演出。戏班子的演员由太监充任。教坊司的乐工乐妇有时也承应御前演唱。所演剧目，据《明宫史》载，有过锦之戏、杂剧故事、水傀儡戏等。明朝宫中规定，每年秋收季节，钟鼓司要演打稻戏。皇帝驾幸西苑旋磨台、无逸殿等处，钟鼓司学艺人扮农夫媪妇及田峻官吏，征租、交纳、词讼等事表现稼穡艰难之意。钟鼓司所演杂剧大多沿用金元时期的院本，一般不做整场演出，只演一部戏中的几出。钟鼓司承应太监经常奉命清唱。由钟鼓司太监及教坊司乐工乐妇在御前所演唱的杂剧主要是一些吉庆戏，如《三星下界》《天官赐福》等。到万历时期，神宗特设四斋近侍 200 余员，专习宫戏、外戏，为皇太后演出外边新编戏文。又自设玉熙宫近侍 300 余人习宫戏、外戏，凡皇帝升座，皆由玉熙宫戏班承应。所习宫外戏有弋阳、海盐、昆山诸腔，不再属于钟鼓司。后来，发展为以昆山腔为主的戏曲流派，一直被宫廷采用。遇有重大庆典时，有时还召宫外戏班入宫献艺。崇祯时期，皇后生日，沉香班伶人曾入宫演出《西厢记》《玉簪记》等戏¹。

明清宫廷戏曲史

故宫藏明代宫廷戏衣研究

清代帝后与宫廷演戏研究

清宫戏曲与中国戏曲发展史研究

清宫音乐与戏曲管理机构南府、升平署研究

清宫戏曲档案文献研究

清代宫廷承应戏的演出

故宫藏戏曲服装研究

故宫藏戏曲盔头靴鞋研究

故宫藏戏曲道具研究

故宫藏清人画戏剧图册研究

故宫藏戏曲乐器研究

故宫藏清南府升平署戏本研究

故宫藏戏曲、曲艺唱片研究

宫廷戏台研究

清宫戏曲舞台美术研究

¹ 万依主编：《故宫志》，第 505～506 页，北京出版社，2005 年。

《穿戴题纲》与清宫演戏研究

朱家溍与宫廷戏曲研究

13. 故宫宗教学

明清故宫除了佛教、道教、萨满教等宗教活动外，还有一类可以称之为“民俗宗教”¹的活动广泛地存在于宫廷之中，成为宫廷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宫中有诸多民间俗神的祭祀，城内西北角有城隍庙，奉紫禁城城隍之神；城隍庙东为祀马神之所，乾隆皇帝下谕旨：“朕所乘之马，祭祀甚属紧要”；宗人府北廊下供奉土地神；御花园中有祭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之祠；此外还有关帝（清代在钦安殿、万春亭等处供奉）、药王（在御药房内供奉）、灶神（今坤宁宫神厨东墙上尚供有“东厨司命灶君之位”木牌一面）、井神（传心殿前有大庖井、清代每年10月祭井神于此）、门神等。在建房时上梁、安吻等都有祭神的习俗。

宫中还有较多节令活动。这些活动许多是沿袭明宫以及更古老的旧习，有的也是清宫所独有。节令中活动最多的莫过于新年前后，主要有：悬挂椒屏、岁轴；开笔书福；腊八粥；放爆竹；挂春联；挂门神；张挂宫训图；祭灶；安天灯；设贡品；掸尘；除夕，皇帝除受朝拜、赐宴等典礼活动外，要到处拈香、礼佛、敬祖，以求神灵保佑在新的一年里国泰民安，吉祥如意；元旦，乾隆帝于每岁元旦，还必书写《心经》一册，并有御制元旦诗，书为屏幅，挂于养心殿；等等。

此外，月令也有很多讲究，多和民间习俗相连，又有宫廷特色。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宫内及北京市肆，均悬灯相庆，故亦称灯节。每年二月初一日，养心殿院内要摆太阳供以祭日。档案记乾隆时太阳糕1个重54斤，1桌共重350斤8两。当时民间亦有此俗，相传自唐代开始。五月五日端午节，清初皇帝和大臣多于西苑乘舟欢宴，乾隆时多在圆明园奉太后于蓬岛瑶台观竞渡。七月七日传说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清宫中规定七夕祭牛女星君，设供献49种，帝、后率内庭各拈香行礼。地点多见在御园。是日并献节令承应戏《七襄报章》《仕女乞巧》。中秋节是中国传统的大节日，宫中亦设供祭月。九月九日登高，传说是为了辟灾。清官亦沿此俗，在京时多登香山。冬至，宫中列为三大节之一，除皇帝亲至天坛举行最高级的祭天典礼并庆成以外，因从这天开始，进入最冷的“数九”天气，在各宫内均挂起《九九消寒图》²。

中国历代宫廷宗教史

明清宫廷宗教信仰研究

明清帝后宗教信仰研究

故宫藏传佛教造像研究

故宫藏传佛教法器与供器研究

故宫唐卡研究

故宫藏传佛教佛堂与“六品佛堂”研究

故宫与藏传佛教高僧研究

1 “民俗宗教”是民众基于其生活的惯例性行为和信条而成立的宗教，它通常并不是由教祖、经典及教义来规范，有关的宗教仪式也多不统一，并且多不依托教会组织而主要是依托地域社会中现存的各种生活组织，其信仰与其说是基于某种抽象的宇宙观，倒不如说是基于对现世利益（诸如迎福、禳灾、转运等）的祈愿。参阅渡边欣雄著、周星译：《汉族的民俗宗教》，第3页、第18页等，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

2 万依、王树卿、刘璐著：《清代宫廷史》，第325～32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

故宫与西藏历代达赖、班禅研究

故宫汉传佛教文物研究

故宫道教与道教殿堂研究

故宫萨满教与坤宁宫研究

故宫与天主教研究

故宫传教士研究

康熙帝与法籍传教士研究

故宫传教士的历史文献研究

故宫与民俗宗教研究

14. 故宫民族学

职贡图是中国古代记载各民族与中央王朝纳贡关系的画卷。最早有南朝萧衍所绘《职贡图》¹，原藏清宫，收入《石渠宝笈》卷三十二，现藏南京博物院。据《石渠宝笈》所载，现存《职贡图》在当时尚存25段，卷后有“赞”。现在仅残存列国使者12人。这12人是（滑国）、波斯国、百济国、龟兹、侨国、狼牙修国、邓至国、周古柯国、呵跋檀国、胡蜜丹国、白题国、末国的使者。在每一个使者的后面有简短的题记，记述这个国家的情况与历来交往的事实。由于它是当时外族使者的写真，并且有着各地历史、土俗的翔实记载，对我们研究当时各族历史、服饰等提供了重要的记载与形象资料。图上的文字记载和《梁书·诸夷传》所记大体相同，但是有的地方却更为翔实，能补充和校正《梁书》。图上很多国王的名字以及所有使者的名字在《梁书》都无记载，有些国名或人名则可校正《梁书》。其后各代相沿，有唐朝阎立本《职贡图》、唐周昉《蛮夷职贡图》、宋李公麟《万国职贡图》、元钱选《西旅贡葵图》、元赵孟頫《贡葵图》等。

清代则有大型民族图志《皇清职贡图》，由乾隆皇帝亲自主持编绘，并钦命傅恒等人撰制，丁观鹏、金廷标、姚文瀚、程梁四人绘图。全书九卷，由画像和满汉合璧图说文字组成。它以清朝盛世时期藩属国、海外交往诸国以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人物为对象，绘制彩图，描摹人物样貌、服饰、生产生活方式等。卷一为清藩属与海外交往诸国，如朝鲜、英、法、日本、荷兰、俄罗斯、泰国、老挝、缅甸、汉莱、柬埔寨等20余国。卷二以下均为国内各少数民族，包括西藏、新疆、关东、福建、湖南、广东、广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区各民族。全书共绘制内外300种民族和地区的官、民人物，每种又各绘男女图像一幅，共图600幅，每图皆附说明，简要说明其分布地区、历史沿革、生活习俗、社会生产以及向清政府贡赋数额的情况。《皇清职贡图》向人们提供了许多珍贵的文字和图像资料，对研究清代各民族的风俗、历史、文化及绘画等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时除彩绘正本外，还复制了三个副本。目前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一套完整的副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部完整的谢遂摹绘本，其他散落各地的画卷皆不成套。

故宫与满族研究

¹ 此画相传是唐代画家阎立德或阎立本所绘，据金维诺先生考证，应是梁元帝萧绎在大同六年前后所作的“职贡图”，也是最早的一张“职贡图”。金先生认为，这张画虽然是宋熙宁间摹本，由于临摹的忠实，并不因此减低了它的价值，它仍然是使我们得以了解南朝绘画，特别是萧绎风格的重要依据。金维诺：《〈职贡图〉的时代与作者——读画札记》，《文物》1960年第7期。

故宫与藏族研究

故宫与蒙古族研究

故宫与维吾尔族研究

故宫编译少数民族典籍研究

历代《职贡图》研究

《皇清职贡图》研究

15. 故宫语言文字学

在故宫语言文字学中，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华夷译语》是一部重要的研究资料。该书为清乾隆年内府抄本。无总书名，亦无序、跋，原有种数、册数不详，现有42种71册，大致可分以下数种：1. 藏族译语，有西番馆译缮的“西番译语”1种5册与四川奉敕采集的“川番译语”9种9册，收录四川省所辖之漳腊、龙安、茂州、汶川、松潘、保县、雅州、宁远、打箭炉、冕宁、盐源等厅、州、县藏语。2. 彝族译语5种5册，包括四川省东川府属等地的“猓罗译语”。“猓罗”亦作保罗、落落、罗罗等写法，即今彝族之旧称。3. 云南永昌府、普洱府、顺宁府及镇沅府所属各地译语13种13册。4. 广西庆远、太平、镇安三府所属土州县司译语3种3册。5. 西洋馆译缮西欧、南亚诸国译语共计11种36册，有伊达礼雅（意大利）、弗安喇西雅（法蓝西）、额呼马尼雅（德国）、播都噶礼雅（葡萄牙）、拉氏诺（拉丁）、英吉利国（英国）等西欧诸国译语6种27册。亚洲地区诸国译语共5种9册。计有缅甸译语、西天真实名经（古印度梵文）译语、苏禄（菲律宾）译语、暹罗（泰国）译语及琉球土语。根据史料研究，乾隆十三年九月乾隆帝曾命集西洋、缅甸、暹罗及海外诸国、西北边疆藏、彝等族用语，依类编辑成书，并交由傅恒、陈大受、那延泰三人主其事。此书当为傅恒、陈大受等奉敕编纂的。故宫所藏《华夷译语》虽系残本，仍是我国传世诸种版本《华夷译语》中，收录语种最多的一部，并且是尚未付刻的罕见孤本。对研究清代西欧、南亚诸国语言和我国西南边陲藏、彝、傣、土等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乃至翻译史，都是极具参考价值的。同时，在现存清代内府编纂的抄本书中，也是颇具特色的一种¹。

故宫满族语言文字研究

故宫蒙古语言文字研究

故宫藏族语言文字研究

《华夷译语》研究

清代敕修韵书《音韵阐微》研究

故宫甲骨文研究

故宫石鼓文研究

故宫藏陶文、玺印文字、钱币文字研究

唐兰的文字学研究

罗福颐的文字学研究

16. 故宫辞书学

1 参阅齐秀梅、杨玉良等：《清宫藏书》，第281～283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清代重视词典特别是民族语文词典的编纂，是语言文字划时代的成就。《康熙字典》收字 49030 个，是康熙帝敕纂的集历代字书之大成的一部官修字典，也是我国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大型工具书。《康熙字典》的告成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它的部首排列方式和检字方法，已为此后新编的大型汉语字典广泛沿用。编的最多的还是民族语文词典。清统一全国后，为适应各民族文化交流的需要，同时也为便于八旗子弟学习满文，由官方组织人力编纂了大量的满文工具书。一些学者也编写了不少著作。如康熙帝敕修《清文鉴》25 卷，后经乾隆年的不断增补、发展，“清文鉴”系列发展为《御制五体清文鉴》。这是一部辑满、藏、蒙古、维吾尔和汉 5 种不同语言文字的对照分类辞书。全书编译告成均经乾隆帝审定，共收词目 18600 余条，内容极其丰富，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军事、风土、人情等。不仅对当时这些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桥梁作用，而且对于今天的专业人员了解 200 年前满、藏、蒙古、维吾尔和汉族 5 种语言的词汇面貌，提供了宝贵资料。

乾隆时期，为了解决满文著述和翻译中使用词语混乱的现象，曾对满语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后来称整理前的满语为“旧清语”，称整理后的满语为“新清语”，同时编纂了大量满语规范化的工具书，如《钦定清汉对音字式》《实录内摘出旧清语》《新旧清语汇书》等。清朝末期，统治者曾在满文的推广上下了一番苦功，授意编辑刊刻或重刻了大量的有关满文语法、词汇等方面的书籍，以加强在语言文字和文化上的控制。仅光绪一朝就刊刻或重新刊刻了《清文接字》《清文虚字指南编》《初学必读》《清文补汇》《清文典要》《清文总汇》《满蒙汉合璧教科书》《满汉合璧四十条》《清语摘抄》等书。这些书在语言学上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北京故宫现藏清宫民族语文词典 50 余种，有些具有重要的价值。例如《钦定西域同文志》，24 卷，是专门搜集西北地区人名、地名、官名的满、汉、蒙、藏、维、托忒文合璧官修注解词典，也是一部标音词典，乾隆帝敕令傅恒等撰，是清代唯一一部 6 种文字合璧的词典。该词典流传不广，有乾隆二十八年武英殿刻本、抄本、影印本、晒印本等流传于世。2001 年被收于故宫博物院编、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故宫珍本丛刊》中。全书共 738 页，收 719 条地名、572 条山名、538 条水名、1373 条人名，合计 3202 条满、汉、蒙、藏、维、托忒文对照词语。该词典虽词汇量不多，但语种多，是翻译这 6 种文字的最重要的工具书，对研究清代西北地区地理、历史和各民族语言、文化具有很高的价值。其中的托忒文，又称卫拉特文，是清代卫拉特蒙古使用的一种文字。卫拉特是蒙古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在清朝初年时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的西部，故又称为“西蒙古”。17 世纪末至 19 世纪托忒文在卫拉特蒙古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卫拉特蒙古的几个政权以及中亚诸多民族在与清朝的交往中曾把托忒文作为外交文字使用。这些使得清政府在对外事务当中不得不重视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托忒文。从《西域同文志》内容及形式看，也可以说它是一部辞典类的史籍，它用包括托忒文在内的 6 种文字对卫拉特等部世系进行了详尽的叙述¹。

《钦定辽金元三史语解》，为满汉合璧辞典，是选录辽、金、元三朝史书中人名、地名、官名等，并加注音、注解而成。因编纂该三朝史书的臣僚们不懂这些民族语言，因此书中用汉字来转写的专有名词在不同卷册中却不完全统一，为此乾隆帝特谕校正这些词语，敕修此书。书中以索伦语正《辽史》中契丹语音韵借词，

1 M. 乌兰：《卫拉特蒙古文献及史学——以托忒文历史文献为中心》，第 120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

以满语正《金史》中女真语音韵借词，以蒙古语正《元史》中蒙古语音译借词，收 6689 条词语，对研究辽金元三朝历史以及契丹族、女真族、蒙古族等语言文化均有重要价值。

《御制翻译名义集正讹》，是乾隆帝为庆贺皇太后八旬盛寿节的敬书，是一部满汉蒙藏合璧的分类词典。全书共 312 页，收 1015 组汉藏蒙满文对照词语条目。本书是一部专门修改、考证宋朝释法云所编《翻译名义集》中出现的汉文误译词的小型官修分类词典，词汇量虽少，但却是翻译佛教经典、研究佛教文化的珍贵资料。此外，该词典是一部标音词典，是清代唯一一部由藏文阿礼噶利字、蒙文阿礼噶利字、满文阿礼噶利字等转写梵语词语的汉藏蒙满合璧词典，可为研究清代藏蒙满汉语语音学提供珍贵的语音资料，也是佛教名词及印度古地名研究的重要资料，其中还保存了一些有关翻译理论知识¹。

康熙帝的辞书编纂及《康熙字典》研究

乾隆皇帝的语言学造诣及敕修词典研究

故宫藏清内府满蒙文词典稿本价值研究

清代官修词典与坊刻词典、私人刻词典研究

清宫词典编纂对于中国辞书学的继承与发展研究

清代民族语文词典编纂对于促进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的研究

清嘉庆朝以后民族语言词典编纂研究

“清文鉴”系列在清代满蒙文词典中地位及特点研究

《御制五体清文鉴》研究

《钦定西域同文志》研究

《钦定辽金元三史语解》研究

《御制翻译名义集正讹》研究

17. 故宫科学技术

西洋科技仪器是故宫科学技术研究的重要对象。明清易代，需重颁历法、确立正朔，于是诸种天文仪器就进入宫廷。测量绘制全国地图，地学测量仪器就十分需要。《皇舆全览图》为康熙年间绘制，是中国第一部带有经纬度的全国地图，并在测绘中多有创新。如康熙帝关于里之长度的规定，即以工部营造尺为标准，1800 尺（180 丈）为一里。这一规定对于距离的测定关系重大。而经线一度等于 200 华里，每尺等于经线千分之一秒，这种以地球形体定度制较之欧洲法国米突制的订立要早许多年。还有康熙时采用三角测量法使地图所示各地的位置比较精确。在测量北纬 41 度至 47 度时，发现各度所得的里数因纬度之高低而不同，因而首次发现地球不是圆球而是近乎椭圆形，使得牛顿的地球椭圆说在中国首先得到实证。北京故宫仍保存有康熙朝测绘的《皇舆全览图》的三种不同版本²。李约瑟认为，这一地图“不仅是当时亚洲所有的地图中最好的一幅，而且比当时

1 以上关于清民族语文词典的简介，主要引自春花著：《清代满蒙文词典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年；故宫博物院编：《同文之盛——清宫藏民族语文辞典》，紫禁城出版社，2009 年。

2 齐秀梅、杨玉良等著：《清宫藏书》，第 291～292 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 年。

欧洲的任何一张地图都更好、更精确”¹。雍正朝又曾绘制《皇舆十排全图》。乾隆年平定准部后又派何国琮、明安图等人前往新疆伊犁等地测绘，在康熙舆图基础上补绘而成《皇舆十三排全图》铜版刊行。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向中国皇帝派遣了6位精通数学的耶稣会士，又授予他们法国皇家科学院通讯院士的头衔，这就是著名的“国王数学家”。其中1位后来留在暹罗，其余5位于1688年进入北京。康熙皇帝对这些数学家礼遇有加，并留白晋和张诚在内廷服务，其他3位传教士也得到允许，可在帝国境内任何地方居住并传教。张诚和白晋在科学教育、地图测绘、外交谈判和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²。

康熙皇帝本人对西洋科技有着强烈的兴趣。北京故宫藏清康熙年内府满文精写本《几何原本》，就见证了他的学习过程。该书7卷，希腊人欧几里得著，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编译，是传世的唯一一部满文编译的西洋数学专著。康熙曾向南怀仁、明安多学习天文仪器的用法和算学知识，进而又向法国教士张诚、白晋学习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几何学。由于张诚、白晋在宫中任职后，曾学过9个月的满文，故能以满语进讲，康熙经过四五个月的学习，不但掌握了几何学的基本原理及其运算方法，甚至对更为复杂难解的球体、圆筒形、圆锥形、楔形的比例或容积，亦能潜心精算。而这本满文《几何原本》，就是张诚、白晋在康熙二十九年奉敕依据他们的满文讲稿编辑而成的。北京故宫还收藏有经康熙审定编译的《几何原本》12卷本和7卷本两种汉文抄本。³陈寅恪先生对此满文译本的价值与意义评价甚高，“然则此七卷之满文译本者，盖景陵（指康熙帝）当日几暇格物之书，西海畴人重译颞门之业，迄乎兹世，犹在人间，即此一段姻缘已足特加珍护。况复借以得知欧几里得前六卷之书，赤县神州自万历至康熙六百年之间，已一译再译，则其事之关系于我国近世学术史及中西交通史者至大，尤不可以寻常满文译籍等视之矣”⁴。

北京故宫还藏有一部《西洋药书》，为西方医药书籍的满文译本，康熙年译，2函4册。原书作者亦为法国人白晋、张诚。因当时康熙帝患心悸、唇瘤、疟疾病，被西方医生用药治愈，因此康熙对西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传旨白晋讲述西方药学知识。张诚在宫内设立化学药剂室，用西法制药，并多次翻译有关知识。后奉康熙帝之命，二人合作在较短的时间内，写出18~23篇各种西药讲稿。在此基础上又充实了一些内容，汇编成《西洋药书》⁵。康熙帝对数学情有独钟，曾根据数学工作者要求而核准编撰了《御制数理精蕴》一书。这部数学著作共53卷，既有传入的西方数学知识，包括几何学、三角学、代数以及算术的知识，又有清代初期一些学人的研究成果，涉及当时数学的各个分支，是一部数学百科全书，流行广泛，影响深远。

康熙帝勤于思考，还著有《康熙几暇格物编》，内容主要是对天文、地理、古生物、动物、植物、医药、哲学等科学文化现象的调查、实验。有些是对于自然现象的记述，如在“定南针”条中对同一地区不同年代磁偏角有变化的记载，在“达发哈鱼”条中对黑龙江达发哈鱼（大马哈鱼）洄游现象的记载。属于科学实验

1 [英]李约瑟原著、[英]柯林·罗南改编、江晓原主持、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中华科学文明史》上册，第4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2 [法]伊夫斯·德·博西耶尔夫人著，辛岩译，陈志雄、郭强、古伟瀛、刘益民审校：《耶稣会士张诚一路易十四派往中国的五位数学家之一》，大象出版社，2009年；[德]柯兰克著，李岩译，张西平、雷立柏审校：《耶稣会士白晋的生平与著作》，大象出版社，2009年。

3 齐秀梅、杨玉良等著：《清宫藏书》，第406~407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4 陈寅恪：《几何原本满文译本跋》，《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4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5 齐秀梅、杨玉良等著：《清宫藏书》，第392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和验证的,如在“蒙气”条中,通过观察,证实蒙气差的形成,做法正确;在“御稻米”条中,记载了单穗选择而获得优良稻种的实验经过;在“风随地殊”和“风无正方”条中都讲了验证风向的问题,特别是“风随地殊”条中,验证是不连续风向,非常重要。书中还有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如在“泰山山脉自长白山”条中,认为山东的泰山是长白山脉通过辽东半岛和渤海进入山东而形成的,这是非常可贵的见解¹。《康熙几暇格编》所有短文最初收在雍正十年出版的《康熙御制文》中。

清朝初期与耶稣会士的互动创造了几位杰出的数学家,康熙帝也重视本土数学家的培养,以减少清廷对西方传教士精确的天文知识的依赖。梅文鼎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梅文鼎等接受了从西方传来的科学知识,又重视中国传统数学的成就,通过自己的研究整理,使明代以来传统数学和天文学重获生机,使新移植过来的西方数学和天文学在中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²。

清宫还刻印过一些反映清代科技成就的著作。例如《工程做法》,原刻本封面题签为《工程做法则例》,但版口中缝上只刻“工程做法”四字,故有的称它为《工程做法》;又因本书由工部颁发,有的称它为《工部工程做法则例》。此书刊行于雍正十三年,成为当时管理京师内外官方营建工程的重要依据。其中包括工程做法、用工、用料、匠作以及建筑构件名称、价格等项内容,有的还附图示意,是一部反映清代工程技术的专著。又如《医宗金鉴》,90卷,太医院院判吴谦等人校理古医书和私传验方,编成刊于乾隆七年。该书于中医学理论和治疗经验论述详尽,至今仍是学习中医学的必读书。还有《钦定授衣广训》,嘉庆十四年武英殿刻本,此书是一部专论棉花作物的农书,图文结合,翔实记录和系统总结了清代中期棉花栽培和纺织的基本经验,成为迄今已知国内外最早的棉作学图谱。

故宫西洋科技仪器(天文类、数学类、地学测量类、钟表类)研究

故宫西医医疗器械(人体解剖模型、制药器具和诊疗器具)研究

清宫制造科技仪器研究

故宫科学技术与法国传教士张诚、白晋研究

故宫藏满文译本《几何原理》研究

故宫藏满文译本《西洋药书》研究

康熙朝《御制数理精蕴》研究

《康熙几暇格物编》中的科学史料研究

《皇舆全览图》《皇舆十排全图》与《皇舆十三排全图》测绘研究

雍正朝《清工部工程做法》研究

乾隆朝《医宗金鉴》研究

嘉庆朝《钦定授衣广训》研究

清宫造办处各作技术研究

1 参阅李迪译注:《康熙几暇格物编译注·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2 (美)艾尔曼(Benjamin A. Elman)著原祖杰等译:《科学在中国(1550~1900)》第四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杜石然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通史卷》第九章第五节,科学出版社,2003年。

清宫造办处与苏州研究

清代宫廷与地方工艺技术交流研究

清宫江南三织造研究

18. 故宫图书馆学

历代宫廷藏书研究

明清宫廷藏书史

明清宫廷藏书楼建筑研究

故宫刻本研究

故宫写本研究

故宫稿抄校本研究

故宫善本研究

故宫丛书、类书研究

故宫藏书板研究

《永乐大典》研究

《古今图书集成》研究

《四库全书》研究

《宛委别藏丛书》研究

《清文翻译全藏经》研究

清内府泥金藏文《甘珠尔经》研究

武英殿聚珍本研究

故宫满蒙藏汉大藏经研究

故宫道教典籍研究

故宫藏满、蒙、藏等少数民族文字图书研究

故宫典籍保护与利用研究

故宫图书馆史

19. 故宫出版学

中国历代宫廷出版研究

故宫明清出版史

清宫内府刻书研究

故宫武英殿修书处研究

故宫清代书目编纂史

清宫出版印刷史研究

《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与中国古代活字印刷技术研究

清内府书籍装帧艺术研究

殿版版画插图研究

故宫博物院民国时期出版史

故宫博物院故宫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出版业研究

20. 故宫明清档案学

明清王朝的文书档案制度研究

明清档案存藏研究

明清档案整理、管理研究

清内务府档案与清代宫廷史研究

《清内务府陈设档》与故宫文物、故宫陈设研究

《清内务府奏销档》与故宫文物、宫廷建筑研究

《清内务府活计档》与清宫物品制作研究

故宫藏清代帝后服饰图样研究

清宫老照片研究

清宫舆图研究

清逊帝溥仪档案与故宫研究

21. 故宫文物保护学

故宫文物传统修复技艺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研究

故宫有机质文物的修护研究（古书画、纺织品、唐卡、象牙、油画、壁画、地毯、木器、漆器等）

故宫无机质文物的修护研究（青铜、金银器、陶器、瓷器、石质文物、钟表、宝玉石镶嵌等）

故宫文物的预防性保护研究（温湿度监测、光环境监测、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防震与隔震技术、病虫害防治、微生物病害的预防等）

故宫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古字画装裱修复技艺、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古代钟表修复技艺、金石传拓技艺、古代木器家具修复技艺、文物囊匣制作技艺、漆器修复及复制技艺、镶嵌修复技艺等）

22. 故宫博物馆学

故宫遗址博物馆学

古物陈列所史

故宫博物院史

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研究

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会研究

故宫博物院文物南迁研究

“一个故宫，两个博物院”研究

故宫博物院人物研究
故宫博物院文物收藏与管理研究
故宫博物院文物鉴定研究
故宫博物院陈列展览研究
故宫博物院学术史
故宫博物院对外交流史
故宫博物院安全保卫研究
故宫博物院与信息化研究
故宫博物院与传播学研究
故宫博物院与旅游学研究
故宫博物院与管理学研究
故宫博物院与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二 故宫学的学科特点

(一) 整体性

故宫学的基础是故宫文化的整体性。把故宫古建筑、文物藏品及宫廷历史文化联系起来，故宫就是一个文化整体。这是在故宫认识上思维方式的重大转换。故宫的文化整体性是故宫学的最重要特点。

所谓故宫是一个文化整体，也就是说故宫的遗产价值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对此，可从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来认识。从空间来看，紫禁城的千门万户，所藏的各种文物，以及宫殿与文物藏品后面曾发生过的人和事，种种秘辛内幕，宫廷的文化生活，是一个立体的、鲜活的、生动的统一体。很显然，离开了宫阙往事，没有了附着其中的历史内涵，那些宫廷旧藏的意义和价值势必受到影响。同样地，要保护完整的故宫，不只是保护 72 万平方米以内的紫禁城，还要保护与它有密切关系的其他一些明清宫廷建筑。从时间来看，故宫藏品虽为清宫旧藏，但其中的文物则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化与艺术的各主要门类，而且反映了 5000 年的中华文明史。正是基于对故宫是一个文化整体的认识，故宫学的学术概念才得以形成并提出。

(二) 综合性

故宫的建筑、文物藏品与历史文化的整体性，以及故宫学的研究对象与范围，决定了故宫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科，具有多学科交叉或者说跨学科的特点。

故宫学的综合性特点，在故宫学研究中表现得很突出：

一是需要把院藏文物、古建筑和宫廷史迹这三方面作为互相联系的整体来研究。故宫学关于打通学科界限的要求正是帮助研究者总结实践经验、提高理论认识的基本方法，它将开拓人们对单体文物研究的思路进入哲学化的思维方式即强调联系与发展，进入美学化的思维方式即导向审美与评赏，进入历史化的思维方式

即注重社会与背景，并且扩展到对其他学科的认识，防止孤立地看待文物，防止文物研究（可移动与不可移动文物）的“碎片化”。这是最能体现故宫特色的研究。

二是一个研究课题往往涉及好几个文物门类，是需要多学科协作，全方位展开，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这有利于打破学术研究中的学科界限，进而拓展研究范围和深化研究内容。

三是由于故宫文化的特殊性，文物藏品一般都有相当丰厚的内涵，需要不断地探求，逐步地深入。故宫许多传世的文物藏品，既涉及工艺美术，更与宫廷史、文化史、典章制度等有关，且随着资料的挖掘与视野的扩大，这种研究会不断深入。例如，对于清宫收藏的红山文化玉鹰、良渚文化大小玉琮等文物的研究，则需要与这些文物有关的考古研究成果相结合。又如，乾隆年间所编《西清古鉴》收录周代芮国钟、鼎等青铜器 30 余件，可惜上述重器难究出处，研究价值大受影响。2005 年陕西省韩城市梁带村的芮国文化遗址出土青铜器 6177 件，有关专家考证研究认为，《西清古鉴》所载的芮国铜器就出于此¹。

（三）实践性

故宫是个博物馆，故宫学的学术研究方式与研究成果的表现就带有强烈的博物馆特点，即学理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特点。

故宫学注重有关故宫知识的“内在”性质，即把这一专业领域首先理解为一种实践性的参与和投入，而不是仅仅把故宫作为考察和研究的对象。故宫学的观念价值必将会转化为制度价值，它揭示一种有价值的思维方式以及被连带出来的新的学理阐释方式。这种“新的方式”是故宫的现实需求。故宫学不只是学理概念，而且成为指导故宫博物院实际工作的重要理念。

故宫学是以文物（可移动的文物藏品与不可移动的古建筑）作为研究对象，这不同于一般的主要以文献为对象的研究机构。故宫学研究与文物的收藏、保护、展示不可分割。以鉴定来说，要收藏，就要鉴别真伪，就要划分等级，这就需要科学地鉴定，这是硬功夫，也是博物馆工作的基本要求。因此，故宫学研究不是经院式的烦琐论证，也不是从书本到书本，它直接面对故宫的文物、古建筑、档案、文献，对此进行客观分析、比较，解决宫廷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物证和历代文物的真伪鉴定及其艺术价值、文化联系等诸多问题。总而言之，即以物证史、以物论史，或以物鉴物、以史论物等，都离不开史与物的辩证关系。正因此，故宫学研究的成果除学术论著外，还有大量的成果与业务工作如文物的编目制档、陈列展览结合在一起。例如故宫博物院有一项特殊的陈列，即用宫廷史迹陈列来展示宫廷原状，使人们准确而直观地了解宫廷的有关礼仪活动，澄清“戏说”之风带来的一些错误认识。但这却是一项极为细致和繁难的工作。这个恢复的过程，实际上是一次又一次学科涉及广泛、内容发掘深邃的学术研究活动。可以说，故宫博物院的许多研究人员属于“专家型的学者”或“学者型的专家”。

故宫博物院的业务工作还包括故宫与故宫文物的保护，故宫学需要把人文与科技结合起来。所有故宫保护以及文物修复技术不一定都属于故宫学范畴，但故宫官式古建营造技艺以及在故宫形成与传承的文物修复

¹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上海博物馆编：《金玉华年——陕西韩城出土周代芮国文物珍品》，赵荣序言，上海书画出版社，2012年。

的许多工艺技术，有的已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它们无疑是故宫遗产的组成部分，也是故宫学的重要内容，都需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更好地传承、弘扬。

古建筑研究与故宫保护维修相结合，是故宫学学理性与实践性结合的又一重要体现。例如，历时18年的故宫百年大修到2020年将全面完成，故宫博物院以养心殿工程为收官之作，鉴于养心殿地位重要、影响巨大以及文物建筑复杂的特点，院领导极为重视，定义为“研究性保护项目”，即突出维修工程中的科学性，加强学术研究，力求使维修的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方面都能有科学的依据，都是扎实可行的。《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课题》共设置了35个分课题，涉及与养心殿工程有关的清宫历史文化、文物陈设、文物保护（包括防震）、古建筑技艺以及工程管理等，基本上包括了维修工程的各个方面。据统计，参与的有器物部、宫廷部、文博科技部、古建部、修缮技艺部、研究室、科研处等7个部门，参加课题的研究人员共234人次，其中10人及10人以上参加的课题即达10个，最多的一个课题有14人，这充分反映了筹划者的用心、周到。这一课题的设计，是从维修工程实际需要提出的，也提供了故宫保护工作与故宫学术研究相结合的一个范例。过去故宫维修也有类似做法，但像养心殿项目这样涉及学科门类之广、动员力量之多、组织规模之大，还是第一次，因此也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今后故宫学术研究开展（包括课题选定、组织形式、成果评价等），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故宫学研究中，“故宫学派”已逐渐引起学界关注。90年来，故宫研究者的研究重点从最初的文物点查、整理、刊布逐步转向文物保管、研究与展示等方面，再逐步转向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等综合方面，并且在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故宫学派”。所谓“故宫学派”，即故宫博物院的研究者在进行故宫学学科理论建设和文物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特色的学术流派，其共性是要求研究者从具体文物入手，以相关的文献档案为依据，利用、借鉴有关研究方法，坚持史与物的结合，力戒空论。如徐邦达等先生在书画研究上创立的“鉴定学派”，陈万里、冯先铭等先生在上古陶瓷研究上创建的“窑址调查派”，单士元等先生开辟的“宫廷建筑派”等。当然，由于各个分支学科条件、机遇等综合因素的差异，有的还处在起步阶段¹。

三 故宫学的研究方法

故宫博物院的学术研究，20世纪40年代以前主要是吸收传统考据学，进入50年代后逐步融入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长达90年薪火相传的研究历程，故宫形成了良好的学术传统，包括学术成果、学术思想、学术风格、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以及不同师承的专家之间的团结和合作等，这也为形成“故宫学派”打下了良好基础。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应在故宫学研究中继续发扬。根据故宫学的学科特点，今天的研究更要强调以下三点。

1 余辉：《薪火相传——学人的历史与历史的学人》，载《紫禁城》2005年第5期（总第132期）。

（一）唯物史观

历史唯物主义又称唯物史观。历史观是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根本见解，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中关于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理论，是科学的历史观。唯物史观指出，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由历史发展而来，要承认历史并且尊重历史。有了历史的观点，我们在看待、分析和处理问题时就会更加全面，更加接近事物本身的客观规律。故宫博物院成立90年来，围绕着故宫及其藏品发生过多次重要争论，例如有人提出要废除故宫博物院、拍卖故宫藏品，有的说故宫“封建落后，地广物稀”，要对它进行改造等。在这些人看来，故宫等同于封建主义，故宫文化是需要彻底打倒的。他们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不懂得历史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继承不断发展的连续的动态过程，割断历史去看待和处理问题，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有害的。事实上，故宫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物质载体，代表着我们民族的历史文化，而以博物院形式向公众开放的故宫，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和职责，既承接过去，又联系当下，即与今天的文化建设有着深刻的联系，这是割不断的，也是不可能打倒的。当然，也还有另外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如盲目颂扬封建帝王，对封建等级制度缺乏分析批判，热衷于宫闱秘闻等，这也是非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我们今天对待故宫文化，不能简单化、绝对化，不能全盘否定或一味说好，而应有科学的传承观，应有清醒自觉的反省意识与批判精神，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清其精华与糟粕，在扬弃中发展我们的新文化。

（二）整体性思维

文化整体性是故宫学方法论的哲学基础。故宫学所研究的故宫古建筑、文物藏品及宫廷历史文化等，内容相当丰富，涉及许多方面，但这些方面之间不是杂乱的、零碎的、毫无关联的，而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是一个文化整体。整体和部分相互依存。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离开部分就不存在整体；而部分同样离不开整体，离开整体的部分也就失去其原来的意义。但整体不是多个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将这些部分有效地组合成一个有机体。所以优化的系统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有句名言：“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故宫不是简单的“藏宝”之所，故宫的每一件文物、每一处建筑，都不是互不相干的孤立的存在，其中蕴藏着生动的人物和事件，且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共同构成了宫廷历史文化多姿多彩的场景与长卷。故宫文化的整体性，主要体现在宫廷历史文化的丰富性、完整性。离开了宫廷历史文化整体性视野的故宫文物研究，就可能出现故宫研究的“碎片化”，文物意义、故宫价值的认识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故宫学倡导将故宫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研究，从文化整体的角度去评估故宫的文物价值和文化内涵。同时，故宫学也从文化整体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故宫学的各个领域（如古建筑、文物藏品、宫廷历史文化和博物院史）的深刻内涵及各领域之间的紧密联系。

（三）多重论据法

考证一直是故宫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借助于文物藏品及历史文献，以物证史，或以史论物，史物结合。史学研究的一项任务就是“复原”历史，确切地说，是“复原”接近真实的历史。为此，学术界曾提出“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等研究方法，以推动史学研究方法的发展。故宫不仅拥有保存完整的明清宫殿建筑

遗址，还保存有大量珍贵的文物藏品以及档案典籍，甚至还保留有“师徒传承”的传统工艺技术。因此，故宫学研究的证据可谓是多重的、立体的。这也是故宫学生存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它可以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充分发挥多重证据的优势，以“复原”丰富的、多面的、立体的历史与文化，从而形成独具一格的多重论据法。

四 故宫学的学术价值

故宫学的学术价值是由其研究对象的博大精深所决定的，是由故宫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单士元先生1997年在中国紫禁城学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开幕式致词中有一段话，高度概括了故宫的地位，从中也可看到故宫研究的重大意义。他说：“故宫是一部中国通史，不只是皇宫。从它的建筑布局、空间组合，从匾额楹联里，都能体现出中国五千年的社会发展史、文明史、文化史。其收藏文物是传统。不少文物，除近年田野考古发达以后出土的以外，大都是传世珍品。而传世珍品又多是来自商周及以后的宫殿、堂庙中，最后到明清两代，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因此，它蕴藏的都是历史。”¹

故宫学的内涵很丰富，涉及的范围很广泛，从已发布的研究成果看，许多都是中国文化史、中国艺术史、中国明清史的重大课题。故宫学又包括紫禁城学、明清宫廷史学、明清档案学以及中国古代书画、工艺、金石等古典艺术学。初步梳理，故宫学至少包括如下若干方面：

故宫学与紫禁城建筑的研究

故宫学与明清宫廷建筑（坛庙、陵寝、园囿、行宫、寺观、王府等）的研究

故宫学与中国古代建筑技术与艺术的研究

故宫学与中国古代艺术（古书画、古青铜器、古陶瓷及各类工艺品）的研究

故宫学与明清宫廷艺术品收藏与制造的研究

故宫学与明清时期宫廷修书藏书的研究

故宫学与明清档案整理利用的研究

故宫学与明清典章制度的研究

故宫学与明清民族问题的研究

故宫学与明清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

故宫学与明清宗教政策及宫廷宗教活动的研究

故宫学与明清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的研究

故宫学与明清皇帝、后妃子嗣、太监宫女的研究

故宫学与明清朝臣疆吏的研究

故宫学与中国近现代革命史的研究

故宫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化史的研究

1 《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二辑，第386页，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故宫学与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研究

故宫学与故宫专家学者及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

故宫学与90年来中国文物保护的研究

故宫学与有关文物修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研究

故宫学与文物科技保护的研究

故宫学与故宫古建筑营造技艺传承的研究

以上各个专题研究，可以说是从故宫学的横向联系展开的；而从纵向联系来看，每个专题都可能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而将古建筑、文物藏品与历史文化相结合，就使得故宫学研究有了更为广阔的天地与无穷的魅力。

故宫学重要而独特的学术价值，还与其研究对象故宫建筑与故宫文物所具有的集大成性特点有关。清代文化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总结性，即集传统之大成的潮流。所谓“集大成”，从本质上讲是对于传统的全面整理和总结。如在学术文化方面，《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的编修；在美术方面，如《营造法式》集历代建筑之大成，园囿离宫集公私、南北园林之大成，景德镇官窑集历代制瓷之大成，造办处诸作集历代特种工艺之大成等。内府度藏，至乾隆朝而极盛大备¹，明清为封建社会的末期，也是封建制度最为成熟的阶段，这种集大成性在有关典章制度类文物上的反映尤为明显。例如，故宫宫殿就是中国古代宫殿发展的集大成者。夏商周宫殿的“前堂后室”、朝、祖、社三位一体以及四合院的格局，秦汉宫殿的中轴对称的群体构图方式，隋唐宫殿的左中右三路的对称规整格局，宋金元将宫殿区置于城内中央的形制等，都在紫禁城建筑中得到了体现。此外，故宫留存大量有关皇帝衣食住行、礼节仪式等方面所使用的设施和物品，这些都是长时期的礼仪服御制度演变发展的结果。宫廷历史文化的主体是宫廷典制，而封建社会对皇帝来说，国和家是一体的。因此，宫廷典制中许多内容就是王朝典制，即国家典制。这些典制是封建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转的根本。

马克思提出了“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的方法论，即“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²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马克思研究商品，不是从有商品交换的古希腊开始，而是从商品经济走向成熟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开始，所以说“资本主义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借鉴马克思这一理论，作为封建典制最为成熟的明清时期，故宫这些宫廷文物及遗存所具有的集大成性特点对于研究封建典制的演变过程是有重要意义的。

五 故宫学的实践意义

建构故宫学，总的目的是不断推进故宫的综合研究，努力挖掘故宫文化的深邃内涵。为什么要不断研究、发掘故宫的价值？这是故宫特殊身份所决定的，也是时代的要求。故宫过去是皇宫，皇宫变为博物院具有特殊意义，起着塑造民族国家群体身份的作用。皇室珍藏曾具有政治意义，与王朝统治的合法性、继承性

1 王朝闻总主编：《中国美术史·清代卷（上）》，第10～11页，齐鲁书社、明天出版社，2000年。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

有关，这些珍藏在抗战期间避寇南迁，与中华民族同命运，成为民族文化命脉的象征。故宫又是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海内外了解中华历史文化的窗口。另外，随着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高速发展，人们更重视文化的自尊与自信，倡导文化的复兴，谋求本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柱。故宫作为传统文化重要载体，自然成为关注的对象，人们对故宫寄予新的期望，因此对故宫的意义与价值也需要充分的、新的阐释，以发挥故宫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扩大中华文明影响力与进行文明对话等方面的独特作用。

故宫学的提出与发展，有如下五方面实践价值：

第一，有利于文物保护观念的转变。过去由于传统的“古董”“古玩”等观念影响，在故宫文物认识上有很大局限性。故宫学的提出，有利于提升故宫保护的理念，拓展对文物的认识，促进对故宫遗产全面、完整地保护。现在从故宫学视野来看，凡是反映宫廷历史文化的遗迹、遗物，都有价值，都是故宫遗产的一个部分。从大文物的观念出发，不仅要加强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第二，有利于故宫学学理性的拓展。故宫学的提出是故宫研究不断深入的结果，是按其自身逻辑发展的产物。故宫学体现了对于学理发展的人性化要求，体现了科学与人文、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相统一的趋势。它甚至把故宫所固有的特征都体现在现代意识的叙事中。因此有利于学理性的拓展，即故宫知识性认识向学理性认识的深入。同时故宫学将促进故宫社会角色的演进，提升故宫在创新能力日益成为最为关键的社会中的学术地位。

第三，有利于国内外研究力量的广泛参与。故宫学是个综合性学科。学术为天下公器。故宫学研究不只是故宫博物院以及有故宫藏品的机构与个人的事，而是学界的共同事业，需要海内外多种专业机构与研究人员的参与。只有国内外研究力量广泛参与，交流合作，取长补短，才能进一步激发学术研究的活力，取得更大的成果，也才能使故宫学真正发展成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因此，故宫学是推进故宫学术交流、科研互助、资源共享的有力举措。

第四，有利于加强清宫流散文物的研究。由于历史的原因，从近代以来，清宫中的不少书画、陶瓷、青铜器、典籍、档案等流散到海内外一些机构或个人手中。清宫文物在海内外的大量散佚，客观上也为更多的机构与个人参与故宫学研究提供了条件。故宫学倡导“故宫在中国、在北京，故宫学在世界”的理念，认为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清宫旧藏有着内在的联系，它们的文化精神是故宫学的一部分，故宫学是其学术上的归宿。只有在故宫学的视野中看待这些似乎互不相干的一件件孤立的文物，它们才有了生命，有了灵气。特别是近几年来两岸故宫博物院打破60年的隔绝状况而有了良好的交流合作局面，其深层动力就是两岸故宫文物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海内外、国内外的广泛参与，把故宫的文物包括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文物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与故宫古建筑联系起来研究，将会进一步挖掘故宫的丰富内涵，认识故宫的完整价值。

第五，有利于故宫知识的普及。故宫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不是简单的旅游胜地。要让每一个普通观众的故宫之旅成为一次难忘的文化朝圣，要使观众从一般“游览”的心态转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景仰、熏陶、启迪，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故宫知识的普及，需要给观众一个有关故宫的总体知识。故宫学研究的深入，有利于对社会公众普及故宫知识并提高其对故宫的整体认识水平。

